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丛书

SELECTED ESSAYS ON SCIENCE FICTION



外国科幻论文精选

王逢振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学术基金重大项目
No 04BZW01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科幻文学理论研究标志性工程

外国科幻论文精选

王逢振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科幻论文精选 / 王逢振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7

(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丛书/吴岩主编)

ISBN 978-7-5366-9442-2

I. 外… II. 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408 号

外国科幻论文精选

SELECTED ESSAYS ON SCIENCE FICTION

王逢振 主编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陈兴芜

责任编辑: 冯建华

责任校对: 郑 葱

封面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 000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42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9442-2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速度显著提高,开始对质朴自然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刻。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科幻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描述并参与了这一宏观社会变革。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更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从内容上,它所包含的“启蒙”、“理性”、“进步”和“科学”等宏大主题,将其牢牢地镌刻在现代性大厦的相应位置。从手法上,它所采纳的各种前卫性美学尝试,对古典小说核心特征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又使它不容怀疑地处于各个时代新旧美学更替的“刀锋边缘”。

科幻文学从来不是主流文学,但却从来享有着比主流文学中多数作家更多的读者。从雪莱夫人到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斯、艾萨克·阿西莫夫、郑文光、叶永烈,再到今天的乔治·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科幻文学在学术领域的遭遇和在普罗大众中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地位的突破性改变,由于后现代哲学的普遍繁荣,科幻文学的学术景况也正在逐渐改变。在自然和技术领域,科幻正在成为新知识的增长点。美国宇航局甚至提供经济资助去探索科幻文学中可能的新的宇航方式。在公共管理实践方面,由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成了一段时期世界各国规划未来网络发展的参考读物。当然,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传统的、曾经对科幻文学嗤之以鼻的人文领域。在大学文学院中,有关科幻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幻文学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被重新估价。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除了上述种种状况之外,还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科幻翻译和创作就已经展开。诸如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都曾经给这一文类的发展做过身体力行的推进。新中国建国之后,科幻文学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甚至常常被政治运动所殃及。即便在政治环境良好的时期,社会舆论和学术视野中的科幻文学也呈现出永恒的边缘化

趋势。是这种文学本身存在着什么奇异的特性？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无法接受这种舶来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以我的名义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并展开了系列研究。该研究的全名是“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批准文号为 04BZW012。在获得项目批准之后，立刻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委员会由王泉根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王逢振教授，成员包括郭建中教授、吴定柏教授、王建元教授、张美妮教授、陈晖副教授、伊丽莎白·安·霍尔(Elizabeth Ann Hull)教授、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教授和格雷·威斯特福(Gray Westfahl)教授。

本研究计划中的成果包括两套基本理论丛书和一套国外科幻理论译文，总共 15 本。分别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上海出版集团出版。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承担了核心部分“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丛书四册，其中吴岩著的《科幻文学论》承蒙多方首肯，列入了久享盛名的“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百万基金)资助项目。

“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丛书分四册。分别为吴岩著的《科幻文学论》、吴岩主编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王泉根教授主编的《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和王逢振教授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

本丛书的编辑宗旨不是面面俱到，而像丛书名字中所陈述的，是期望在新思维方面给科幻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启迪。阅读中读者一定会发现，无论从各分册或文章的选题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本丛书的作者突破了以往比较单一的文学研究模式，试图以多元视角和方法探索科幻文学。笔者认为，对于科幻这种跨越学科的文学存在，是值得肯定的探索。

本丛书自始至终得到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罗小卫董事长、陈兴芜总编辑的支持。责任编辑冯建华先生是我从事科幻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好友。他对我工作的信任，对我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暂时停滞所表现出的超常的容忍，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事业和人生经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王泉根主任从选题、约稿到编辑和最终丛书完成，都手把手地指导，并多次给我鼓励，要我放手做，不要太多框框。他对我学术成长方面的殷切期望，也给这套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教授，是我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熟识的老师。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率先开始翻译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进入中国。进入 90 年代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当我向他求助，要求他参与到本书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中的时候，他不但欣然同意，还主动承担了外国科幻文论的选编和翻译工作。谨此向他表示衷心感

总 序

谢。本人的硕士研究生高福军、方晓庆、胡俊、肖洁、陈宁、刘妮、房立华承担了大量撰写和事务性工作,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对中国科幻文学理论体系建设进行的基础工作。由于时间和学识的限制,丛书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错误。所有这些不当之处,责任在笔者本人。希望读者恳切提出意见,我们一定会修订和改进。

吴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7年7月26日

前 言

近年来,科幻小说在我国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出现一批年轻的作者,读者队伍不断扩大。四川成都专门发表科幻作品的《科幻世界》,发行量 30 多万;福建的《世界科幻博览》和山西的《科幻大王》,发行量也相当可观。这些都可以说是明显的例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科幻小说的研究一直非常薄弱。所幸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招收科幻专业的研究生,但愿以后的情况会逐渐好转。

其实,早在 30 多年前,美国许多大学的文学系就开始开设科幻专业课,随后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如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专门收藏科幻作品,不少著名学者也加入到科幻研究的行列(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达科·苏文)。从研究的角度,探讨科幻小说的批评和理论,相信会对我国科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西方科幻小说具有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推测性著作。但是,作为现代的一个文类,它大体上始于 18 世纪后期间时出现的两次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发展的后果之一是复活并改变了乌托邦传统,从空间性转向了时间性,从对地球上某种想象的理想社会的描写转向了对更好的社会模式的思考,并期望通过政治变革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实现。科幻小说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时刻,它以想象的小说方式,思考社会的变革,思考它的未来,以及科学技术对这种变革可能发生的作用。

科幻小说的定义是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细究起来,恐怕有上百种界定。为了方便,这里以三种方式来界定这一文类。最常见的是根据题材界定,例如有人说科幻小说写未来的生活、未知的世界和意外的来访者,或者写想象的旅行、未来的预测、奇特的发明和对社会的讽刺。《科幻小说影视百科》提出了 19 种题材,《插图本科幻小说书目》在空间和时间旅行之外,列举了 20 种其他主要的题材。实际上,人们说到科幻小说时也常常指它的题材。第二种方式是找出科幻小说的基本形式特征和文类特征,使它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幻想”文学,例如科幻小说有一种想象的框架代替作者实际经验的环境,但在作者所处的时代又不是毫

不可能,而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推断来说明作者投射到未知的空间或时间领域里的想象的境遇。第三种方式认为科幻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历史语境,包括这种写作生产和接受的条件,以及读者对作者和题材的期待。

在现代科幻小说里,有些作品描写技术创新的想象,充满了乐观主义;有些描写科技的局限和矛盾,包括技术设备、精英主义和对民主的阻碍;有些描写科技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些描写乌托邦想象和对社会的批判。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典型地表现了理性和科技发展的某些可能。他的系列小说《我,机器人》(1940—1950)描写了人类发展和机器人应用的不同阶段,从早期的机器人助手一直到庞大的智能机器人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这些故事基本上构成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的基础,集中体现了人类对机器人的怀疑。它们描述机器人和计算机技术的改进,以及人类逐渐克服对这种有益的技术发展的抵制心理。第一个故事写一个机器人保姆,主要完成家务工作;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多年以后,描写在庞大的“计算机器”控制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

在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由11个中篇和短篇小说组成)系列里,科学技术还被表现为一种有益的和批判的力量。它利用科学技术测绘并预言人类的行为,然后提出改变各个星球发展的战略,从而缩短银河系的黑暗时期。这种想象既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小说第一个故事写于1942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同时也是在为理性和科学的理想辩护,它的实现依赖于一批科学精英,因为科学精英对银河系的各国政府暗中进行干预。故事“塞尔顿的计划”的基础是对大量政治危机的科学预测和正确反应,也是“第一基地”的主要内容。但当这些预测被一个难以预料的变体(骡子)超越时,注意力便转向“第二基地”。为了抵制骡子控制人的精神能力,第二基地采取了更敏感、更有效的心理控制,这在女主人公的实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阿加迪娅·达瑞尔所说,“她永远不会知道,她已经受到控制,而且会觉得更好,因为对她的控制包含着一种难得的智慧个性的发展。”

从今天的视角看,阿西莫夫的小说不仅可以解读为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而且还可以解读为对最近美国帝国主义政治干预的一种无意的预示。“精神历史”的目的不是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保持已经存在的秩序,使之不受外来干涉的威胁。考虑到当时法西斯的威胁,这种维护秩序的观点也许不无道理,但是由于阿西莫夫运用历史循环的模式,描绘的是一种资本主义伦理和经济得到维护的未来,所以实际上他否定了根本变化的可能。他这种把未来资本主义化的做法,不仅是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反应,而且也是对改变社会结构的威胁的

反应,当时恐怕是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反应。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罗伯特·海因莱因,他的故事《道路必须滚动》把科技变化与社会责任和社会权威结合在一起。他比阿西莫夫更加明确地把政治家抛在一边,而工程技术人员变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英雄。在海因莱因描写的近期未来里,科技使人们逐渐摆脱了对汽车的依赖,代之以全国范围的道路网:机械化的、以太阳能为动力的人行小路。一个心怀不满的工程师说服他的一些道路工人举行非法罢工。为了个人利益使交通瘫痪的自私,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承诺和信任并置在一起。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盖恩斯,他是西海岸道路的总工程师,但却冷静而有效地处理了罢工引起的各种危机。工程技术人员与道路工人不同,他们是精英分子,在一种专门化的大学接受教育,其目的是唤起人们的责任和忠诚,传授先进的技术,完成他们的工作。

海因莱因的另一篇小说《宇宙》展现了理性让位于教条的情境。它是人们熟悉的一种科幻叙事:宇宙飞船在空间里消失,天文学和物理学以及太空飞船和太空旅行的真实性质已被忘记。它可以读作科幻小说对迷信的启蒙批判的一种方式,因为知识已经消失,以科学为根据而开始的活动已被忘记,并被意识形态的解释取而代之。休先生的冒险和为了禁止的知识而进行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像伽利略的故事那样,旨在反对统治的意识形态。而对此理解的那些人都是被排斥在外的人,因此科幻小说对那些觉得自己的智慧和专业知识被忽视的群体具有明显的感召力。

在科幻小说里,这种通过科技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显然不同于先前的“新发明科幻小说”(gadget science fiction),也不同于新形式的关于知识和伪科学的魔幻科幻小说。例如在 A. E. 范·沃格特的《太空密探旅行记》里,作者描写了一种具有无限潜能的新科学:空间密探搭乘飞船,在银河系之间进行科学探索和科学发明。小说写了四个外星人,他们攻击飞船和科学家。但这种遭遇无法由传统的专家解决,而是通过由各种理论综合统一的知识来解决。范·沃格特从他对科技学的热情出发,认为这种知识的梦想会充分释放人类精神的潜力。虽然这种对科学的态度有些极端,但在科幻小说中并不少见,因为他们深信科技的发展将带来一个美妙的未来世界。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科幻小说的直接写作意图大多是与科技发展相关的社会变化,欢呼新的科学和技术所产生巨大力量。这种乐观的观点一直持续到 40 年代初期。不过,甚至在它们热情洋溢地描写理性和技术的种种可能时,许多故事也包含着改变对这种乐观主义理解的因素。在阿西莫夫的小说里,虽

然对社会问题的技术解决已经相当明显,但“技术定位”的概念,或者说新发明可以解决一整套问题的观念,却更明显地出现在戴尔·雷的作品当中。在《海伦·欧洛伊》里,他描写一个近期未来的故事,其中具有人的特点的家庭机器人已非常普通,菲尔和戴夫改进了最新的家庭机器人仆人,把它塑造成一个女孩海伦,使它具有意识并了解生活和感情。改进之后,她被单独留在家里,她看电视并开始读小说。由于这种程序编排,她很快爱上了其中一个男人。经过一番斗争,男人接受了海伦的爱,他们一起搬到另一个小城。在那里,他们像正常的丈夫和妻子一样生活:“她是最可爱的新娘或最美好的妻子。海伦从未因做饭和做家务而失去她的光彩。”她随着丈夫的年龄装扮自己的年龄,最后以印度殉葬的风俗在她丈夫死了时“杀死”自己。

海伦也许是极端的“技术定位”的实例。它类似于许多科幻小说中机器人题材的发展,把机器人作为劳动力后备大军,但超越了把机器人作为替代繁重无趣劳动的简单幻想。在许多小说里,通过把制造麻烦的群体个人改造成驯服的机器,机器人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不论是把机器人用于满足劳动力的需求,还是把它变成一个永远年轻漂亮的“完美”的妻子,机器人都是驯顺的,没有独立自主的情感需要,而这正是机器人幻想小说的标志。虽然这是对社会问题的最简单的技术解决,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涉及到社会需求的两个重要领域。

这些乐观主义观点有一种潜在的矛盾,这就是作品的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像海因莱因《道路》中的工程师那样,认为科技人员在处理直接危机方面比政治家更有能力。即使鼓吹改革,大部分小说的视角也很狭隘,一般关注的只是谁在实际上运用和控制新的科学技术。它们描写一种精英群体的寡头政治,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处理各种威胁,但经过民主讨论或达成共识的方式,也没有决策的过程。科学和技术不只是维护或改善人类命运的方式,它们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运用的工具,而且只限于他们运用,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人类最好的东西。这种小说反对启蒙运动的乌托邦目标,反对受教育的公民参与政治决定。它们提供科技的精英,似乎单靠他们就能够应对种种威胁和危机。

有些小说更明显地放弃民主的理想,大量描写实际的控制,对忧郁或不顺从的同事进行制裁。在阿西莫夫的第二基地里,心理控制的范围扩大到对整个居民的欺骗。正如帕特罗奇所说:“在他们愉快的胡扯中,(阿卡狄亚和她的父亲)及人类已经消失。前面等着的是‘慈善的、精神上最好的专制’,‘那群心理学家已经获得权力’,‘现成的统治阶级’。‘第二基地的追求’已经使第二基地无意间变成最大的悲剧,因为不只是一个悲剧主人公而且是所有人都分享的悲剧。”

这部小说写于1984年,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时间上正好重合。当时批评家常常把西方民主与某些专制政权相提并论,因此联系科幻小说和美国宪法所体现的民主,便显得非常有趣。

通过新技术对渴望变化的乌托邦欲望的遏制,在范·沃格特的《零的世界》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再现。小说开始描写一种精英系统教育,根据对这种人的检验,每个人都符合发展的条件,但很快暴露了事实真相,这些检验是受人操纵的骗局,于是小说的焦点转向了陷入银河阴谋网的超人。

矛盾的是,这种超人的逻辑使决策完全脱离了人的控制,例如在阿西莫夫的《可避免的冲突》里,关于人类在星球上的未来的主要决策是由计算机决定的:

人类总是受经济和社会学力量的支配,因此他们不会理解——对气候的幻想,对战争命运的幻想。现在,机器理解它们;而且谁也无法阻止它们,因为机器对他们就像他们对社会一样——拥有最大的可使用的武器,对我们的经济能够绝对控制……想想看,如果永远如此,所有的冲突最终都可以避免。从现在开始,只有机器不可避免。

有些人认为,这种把决策转向机器是在偷窃人的灵魂,而这些人被称作“反动分子”,说他们如果生活在所写的时代,一定会反对科学,反对写作的艺术。当然,许多科幻小说也怀疑对未来的这种看法,对依靠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持保留态度。与这种怀疑相呼应,也有些作品从政治上应用这一主题,把机器再现为一种控制的形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幻电影里,这种再现相当明显。

对于控制问题,美国著名女科幻作家乌苏拉·勒奎恩认为“他者”是关键的概念,她说:“这里的问题是他者的问题——与你自己不同的人。此人与你可能性别不同,或者年收入不同,或者言谈、衣着和行为方式不同,或者肤色不同,或者头和腿的数量不同。换言之,有性别的艾伦,社会的艾伦,文化的艾伦,以及种族的艾伦。”所有这些不同,都构成了他者的含义。

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科幻小说领域,典型的作品是把未知的转变成已知的,尤其是利用科学和技术来解决问题。理性和他者的关系在于使他者与自己相同,把可怕或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或者摧毁它们。其实,在科幻小说历史上,不论作者还是读者,被社会边缘化或排斥的状况都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都处于边缘而不是代表社会的常规。在40年代,科幻作家为某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说话,他们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计划之外,或者说尚未参与其中,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有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另一种边缘化是作家被主流文学排

斥,科幻文学被认为是低级文学,科幻迷也被认为是特殊的另类人群,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很容易承认他者的观点(这种情况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已经改变,但在我国仍然存在)。当然,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也是他者的形象,但对这种他者应该作具体的分析。

对20世纪许多美国人来说,人们期望科技发展能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从乏味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科幻小说充满了减轻人们劳动的新发明的机器装置的形象,它们可以概括为机器人的形象。但是,即使在机器人表明或预示科技的实际发展时,它也总是隐含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在肯定的形象之外,还有许多对机器人否定的看法,至少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以来,这些看法与对科技进步的信念一直并行存在,象征着对科技危险的集体的焦虑。这是机器人的另一面的意义。它表示工作过程日益“机器人化”(robotization)的负面影响:机器人不仅越来越多地用于工作场所,而且用于工作过程本身。例如流水生产线,结果使人失去了自己的选择,变成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像卓别林的电影《现代时期》所表现的那样。

除了表现对科技的矛盾心理之外,机器人还表明了社会的他者。尽管人们很容易把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看做是公众对科技态度的一种标志,但这种接受(或拒绝)也包含着对他者的反应。例如在他的小说《证据》(1946)里,机器人变成了人。故事的时间是21世纪,语境是一些对依赖更精致的机器持怀疑态度的人的焦虑,情节围绕着一个被指责是个机器人的政客展开,表现了一种对机器人不宽容的态度。

虽然机器人表现大众对科技发展的恐惧,但反对进步和变化的并不只是那些不信任科技的人。想象的、新的、更美好的世界常常被描写成克服这种威胁力量的所在,不论这种威胁是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如阿西莫夫小说中反对机器人的人),还是那些出于迷信和无知而反对的人(如罗伯特·海因莱因的《道路》中罢工的筑路工人)。这种对科技理性的抵制,以及以各种威胁形式出现的他者,可以归纳为敌对的和邪恶的外来人的形象。正是外来人的形象构成了科幻小说中种种不同的态度,包括对他者的恐惧和希望,或者究竟是什么在形成威胁,什么在提供新的可能。

在最近的科幻小说里,乌托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詹姆逊认为,乌托邦一向是个政治问题,是文学形式的不寻常的命运;然而,正如文学形式的价值受到怀疑一样,它的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非常含混。它的历史语境的起伏动荡丝毫不解决这种变化性,而这种变化性也不是一个趣味或个人判断的问题。

冷战期间(以及在东欧它刚刚结束之后),乌托邦一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

词,表示一项无视人类软弱和原罪的计划,暴露出对一致性以及对一种完美制度的理想的强烈意志,因而不得不把这种制度强加给它的不完善的、不情愿的主体。这种反对革命的分析——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右翼也不再感兴趣——当时被反独裁主义的左翼接受,他们的微观政治赞成把差别作为一个口号,承认它的反政府立场,并以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在这种集权和独裁的意义上是乌托邦的。

自相矛盾的是,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加分析地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分析,谴责坚持乌托邦的人没有任何力量 and 政治策略的概念,并把乌托邦主义说成是一种唯心主义,在结构上深刻地与政治本身相对立。关于乌托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关于乌托邦思想的实际价值和政治价值,以及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辨识问题,今天仍然是尚未解决的课题,而乌托邦作为政治口号和一种政治上产生能量的观点,似乎已经恢复了它的活力,因而也变成了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其实,任何乌托邦政治(或任何政治的乌托邦主义)的基本力量,总是存在于一致和差异的辩证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的目的是想象一种根本不同于当前制度的制度,有时它的目的是实现这种新的制度。就此而言,奥拉夫·斯塔普尔顿(Olaf Stapledon)科幻小说中的时空旅行者意识到,他们对外来的、异域文化的接受是由拟人原则决定的:“最初,当我们的想象力受到我们自己世界的经验的严格限制时,我们只能与类似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联系。另外,在我们工作的初期阶段,我们遇到的那些世界都在经历同样的精神危机,好像它们构成了今天人类困境的基础。仿佛我们要进入的任何一个世界,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主人之间都有深刻的相似性或一致性。”严格说,斯塔普尔顿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但是,他非常直截了当地面对伟大的经验主义的原则,在这种意义上,他思想里的东西仍然是新的。它表明乌托邦还可以用于否定的目的:使我们更多地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最好的乌托邦是那些最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实际上,就乌托邦科幻小说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产生新的乌托邦想象的能力,这些新的想象既包括过去那些想象,也包括对它们的修正。

综上所述,科幻小说虽然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流行文化或亚文化,但优秀的科幻小说仍然可以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多种不同的内容和视角。今天,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大众传媒和生命科学的发展,不仅改变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而且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推行一种全球资本主义,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帝国,宣扬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果,贫富差距拉大,失业增加,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

题越来越多,人们在欢呼现代化的同时,也开始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一般认为,民族与流行文化形式是一致的。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活动和实践,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常常依托乌托邦的想象,对社会进行警示或批判。例如,著名科幻作家斯坦利·罗宾森的新作《四十种雨象》,不仅想象了全球变热可能带来的灾难,同时也对布什政府的环保政策进行了讽刺。

因此,对科幻小说进行研究,推进科幻小说的发展和创新,无疑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我们编选这本文集的目的。集中收录的文章既有理论阐述,也有个案分析和综合论述,但明显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在这些文章中,涉及到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多种批评理论,包括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叙事学等。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或文化研究者(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科幻文学研究日益重视,反映了科幻文学研究的某些成果,同时也展现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们不仅可以为科幻作者和爱好者提供借鉴,而且对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人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当然,十多篇文章不可能反映科幻文学研究的全貌,所选文章因资料限制也可能存在不足,这只有靠以后改进。但作为第一本介绍西方科幻文学研究的著作,至少具有开拓的意识。

众所周知,科幻小说虽然属于流行文化,但也多有创造的词语,翻译科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而新的批评理论因新的观念、概念和术语更是困难重重,因此这里的文章翻译很可能有疏漏甚至错误的地方,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科幻研究生导师吴岩的支持下进行的,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图书资料。重庆出版集团的冯建华先生和有关领导一直给予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恐怕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希望中国的科幻不断发展!

王逢振

于北京

2007年12月2日

目录

- 1▷ 总序
- 1▷ 前言
- 1▷ 重新审视近期女权主义科幻小说中的分离主义
 范式
- 20▷ 女性主义赛博朋克
- 38▷ 反面乌托邦之幻想与乌托邦之期盼
 ——论特里·比森的批判式反面乌托邦作品
 《宇宙海盗》
- 59▷ 日本科幻小说:它的独创性和趋向
- 71▷ 普利高津,混沌,以及当代科幻小说
- 90▷ 转达未知世界的信息:科幻作品的交际模式
- 115▷ 追寻完整
 ——二律背反与布鲁斯·斯特灵《分裂矩阵》
 中的“绝对”
- 128▷ 小说中的世界缩影:乌托邦叙事的出现
- 141▷ 时空几何学:时间旅行与现代几何叙事学
- 167▷ 社会科幻小说研讨会
- 174▷ 商品的未来:关于网络朋克和信息时代的评论
- 187▷ 全球化中的恐惧和厌恶
- 195▷ 名词人名对照表

重新审视近期女权主义科幻小说中的分离主义范式

[加拿大]彼得·菲廷 著

孙小芳 王弋璇 译 郭英剑 校

摘要:我们或许可以将帕梅拉·萨金特的《女人海滨》(1986)、琼·斯隆科泽夫斯基的《入海之门》(1986)和谢里·泰珀的《女人城的大门》(1988)解读为是与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思想进行对话的作品。

就场景与情节而言,萨金特的《女人海滨》描述的是一个失败的母系乌托邦社会,女人统治、剥削着男人。从小说呼吁两性之间的和解不难看出,似乎通过接受异性恋的叙述说明,这种社会已经接受了同性厌恶和异性歧视。《女人城的大门》把乌托邦的主题从他择性社会主体的外形关注转移到机械主义,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去改变“人性”和男性的暴力倾向,这正是萨金特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入海之门》有力地指出在保卫乌托邦社会时可能或必须采取的措施是有限的,同时,作品反对20世纪70年代整个乌托邦作品中所提出并认可的用暴力创造新社会的策略。

与20世纪70年代的乌托邦作品相比,这三部小说没有把重点放在他择性社会的唤起上,而是将他择性生活方式的代表与一个革新后社会的更加修辞化的唤起混杂在一块儿。作者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乌托邦作品中有一些灭绝人性的暴行,他们就通过这三本小说对这些行为进行纠正和批判。但有时候,这些暗含的批判又有些过火。在这儿,对界线的借用——门、大门、海滨——似乎不仅代表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世界的幻象,而且表示了通向隐遁之地的大门,通过这扇门作者们正远离70年代乌托邦的希望与梦想——在某种程度,这意味着否定了早期乌托邦的活力。(PF)

乌托邦小说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历史仍未消失。乌托邦记录的是我们对未来的种种幻想。但是在一个充斥着压制与反抗的连续叙事过程中,这些幻想又体现了我们与当下现实的关系。乌托邦式的冲动起因于现实中的根本性缺陷,它解构了我们对于社会必然性

的假设,解构的方式是通过引起生活中的现实和隐藏在现实之中的潜力两者之间的认知不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乌托邦促使我们唤起了政治欲望。(琼·普法尔泽[Jean Pfaelzer], p. 198 ~ 199)

人们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侍女记》(*The Handmaid's Tale*, 1985)的普遍反应使我认识到:后期反女权主义强烈抵制情绪,伴随着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创作步伐放慢这一趋势而不断高涨。但是,就在女权主义乌托邦的创作自1985年以来已经明显呈下降态势的情况下,以女权主义为标志的作品仍是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¹在以下的文章中,我想用更加审慎的眼光来分析三部在阿特伍德的恶托邦(dystopian)经典作品之后出版的小说:帕梅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的《女人海滨》(*The Shore of Women*, 1986),谢里·泰珀(Sheri Tepper)的《女人城的大门》(*The Gate to Women's Country*, 1988)和琼·斯隆科泽夫斯基(Joan Slonczewski)的《入海之门》(*A Door into Ocean*, 1986)。这三部小说经常被人们用作例子来说明不断发展的女权主义乌托邦传统。

在研究这些作品过程中,我将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特征以及作品是如何回答和详细阐述由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就切入点而言,我更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对方法的分析上,而非对文学或“文本”特征的把握,通过这种方法,这些虚构的作品在不断进行着的对话中起到讨论参与方的作用,在这期间许多作家在女权主义和广泛流行的乌托邦传统的影响下,利用科幻小说想象的潜力来唤起和探究一些他择性(alternative)的幻象。为了理解和鉴赏乌托邦文本中的“他择性的历史假定”,我们需要研究文本是如何在批判自身社会的各种准则和结构的同时又试图设想出另一种他择性社会(参看Suvin 49)。正如许多批评家们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的乌托邦创作的标志是采用对早期的纸上谈兵传统进行质疑的方法。然而,即使像莫尼克·维蒂格创作的《女游击手》(*Les Guerilleres*, 1969)这样最“逐字逐句”的作品,无须考虑来龙去脉便可全面把握作品深意——对维蒂格的作品而言,来龙去脉指的便是发生在法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与那些适应同男性共同工作的人这两派(参看Jensen)之间的辩论。我要提出的观点是,在对维蒂格的这部作品——萨莉·米勒·吉尔哈特(Sally Miller Gearhart)的《流浪地》(*The Wanderground*, 1978),或是乔安娜·拉斯的《女丈夫》(*The Female Man*, 1975)这些作品进行解读时,人们必须将注意力放在男性缺席的问题上,正如这种解读需要关注他择性社会的渊源一样。然而,比起在逐字逐句理解吉尔哈特的乌托邦城中的飞行描写,与如何解释在面对维蒂格小说中长篇累牍的名字和叙事并行存在这两者之间作一个决